

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

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主要为处理邦国外部关系的指导方针，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军权。可见，尧舜“中国”大政表现出治国理政“陶寺模式”是王权与军权结合的完美模式。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便认为，陶寺是中原地区第一个崇尚军权与王权相结合模式的“王国”。

从考古遗存来看，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在陶寺早期与中期表达方式略有不同。陶寺早期龙盘的蟠龙由头部与身躯组成。头部分为两种：一种为疣鼻天鹅头的艺术化，特征为疣鼻明显，无列齿和眼睛；另一种为长角鳄鱼头，特征是有列齿和眼睛。疣鼻天鹅的习性及其洁白的外观与优雅的体态，被陶寺作为圣洁高贵的道德模范象征性动物，将其习性赋能为守土有责、守信忠贞、洁身自好、少言实干、爱家孝悌等美德价值观，更被陶寺早期邦国尧王族作为“协和万邦”思想的图示。龙身为赤链蛇，其习性被陶寺人赋能为重土慎迁、藏而不露、不惹事、不怕事，反击时稳、准、狠，且“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陶寺早期，当邦国外部环境较好时，尧王族便将疣鼻天鹅头与赤链蛇身“嫁接”，反映出完整的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理念。疣鼻天鹅宣示仁慈、平和、守信，意为和合政治、协和万邦。赤链蛇有利齿、有微毒，但是一般不主动攻击，这就是“修兵不战”“成而不用”，用黑红强烈对比的斑纹色彩威吓吓退对手或敌害，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威之谓也”。赤链蛇遇到敌害，首先藏头露尾，摇动蛇尾示警，可谓“笑里藏刀”地威胁，此乃“有笑而后刀兵相见”，如若示警无效，则展开稳准狠的反击，这便采用“次政”“囊弓矢以伏天下”。赤链蛇采取的战策略略完全是中国人崇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一旦反击，则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百折不挠”的韧劲，更加符合陶寺文化中王者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治国用兵理念。

陶寺中期王墓头端摆放着齟断犬齿的公猪下颌骨及其两侧摆放的玉石列钺，就是“豮豕之牙上政”的图示。该墓室南壁东南角悬挂8组布袋箭箠，内盛数量不等的鹿角三棱箭镞。南部中部摆两张折断的黑漆弓。这便是“囊弓矢以伏天下次政”的图示。总体来说其基调是“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和合政治”，强调民本、仁政、德政，修兵不战，不穷兵黷武，但也不甘被霸凌，即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用兵准则。上政与次政文武之道，为以集权政治为中心的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保驾护航，同时又可矫正集权政治走向肆意妄为的极端，保障集权政治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前行。

尧舜“中国”大政陶寺模式何以成为“文德”

大约距今4300—3800年之间，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是东亚地区全面进入邦国时代的早期国家政治实验期。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邦国林立，随着距今5000—43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诞生的良渚、石家河等邦国的衰落，其带来的治国理论的迷茫，推动了各个邦国试验和探索治国理政的方略。其中，陶寺邦国成功地创建了“陶寺模式”，这就是尧舜“中国”大政。尧舜率先垂范“中国”大政“陶寺模式”，部分邦国尤其是王湾三期文化夏早期邦国，以尧舜“中国”大政为标杆和榜样加以学习与效仿，由此尧舜“中国”大政便成为“德”。

《尚书·尧典》有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意为尧帝名为放勋，他为人处世不仅恭敬严谨、明达事理、文雅有谋而且宽宏温和。《尚书·舜典》载有“浚咨文明，温恭允塞”，意为舜帝具有深远的智慧，而又文明、温恭、诚实。唐代学人孔颖达对《尚书》的注解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孔颖达的观点，很可能基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由此可见，不论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还是上政次政“和合政治”，都彰显了尧舜“中国”大政之“德”的“文”性。故尧舜“文德”明矣——经天纬地，文武之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 陶寺遗址展现的

□ 何 努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早期距今4300—4100年，是面积达160万平方米的都城。中期距今4100—4000年，是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都城。晚期距今4000—3900年，此时陶寺失去了都城地位，沦为一个大聚落式的大聚落。

经过47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陶寺遗址初步建立起一套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指向陶寺早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尧都，中期都城为文献所记载的舜都。陶寺文化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具体说是陶寺邦国。而陶寺圭尺第11刻度地中标准夏至暑影和陶寺都城以及陶寺邦国，说明最早“中国”的明确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邦国的治国理政思想集成创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陶寺模式”。我们称之为尧舜“中国”大政。“中国”大政包括两大核心内涵：一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另一个是文德上政与武功次政的文武之道。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主要针对邦国内部的治理，偏重于技术性，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王权。《尚书·舜典》说，舜从尧手中接过政权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协时就是校订历法和谐年时，协月便是校订阴历月时，正日即校订昼夜日時，此乃经天。同律、度、量、衡就是统一度量衡制度，属于纬地。帝舜获得王权后，用“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来彰显自己的王权，宣示自己在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中的主导权。具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观象台制定的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制定的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重要的科学软实力。纬地则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东、西、南、北、中土）的天下观——表里山河，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

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其优势在于用基本上属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实际操控，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地中”“中道”思想体系为核心基础，将天、地、人三者完美结合的宇宙观，上升到一个结构合理、逻辑自洽、说服力强的正统的“天下观”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创造出与该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根源，而且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统治模式注入了关键基因。



从考古看文明

西班牙汉学家雷林科：为中国典籍传播拓出新路径

□ 刘 颖

阿莉西亚·雷林科·艾莱塔（Alicia Relinque Eleta），西班牙当代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哲学博士、格拉纳达大学教授，曾任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雷林科品华夏文学、传东方文化，大力推动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班牙、拉美等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时在西班牙《阿贝赛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特别提到“雷林科等当代西班牙汉学家笔耕不辍”，充分肯定其为增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重要贡献。2017年，雷林科被授予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首届“黄玛赛中国文学翻译奖”。2023年，雷林科获得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首届兰花奖“友好使者奖”。

译介古典文学。读书期间，雷林科将《通往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论：〈文心雕龙〉》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并选择《文心雕龙》作为自己的首译本。该书于1995年由科玛雷斯出版社出版，不仅是《文心雕龙》在西班牙语世界的首译之作，也为西班牙语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窗口，相关研究更是以该译本为基础展开。

此后，雷林科发现西班牙一些出版社选取的中国作品译作多丢失其原有的细节与精髓，加之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她先后于2002年翻译出版《中国戏剧三部曲》（《婁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2011年翻译出版《金瓶梅》。2016年，为纪念中国明朝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雷林科的代表作——《牡丹亭》西班牙文译本问世。雷林科坦言：“我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汤显祖繁复精妙的行文，我在翻译时要绞尽脑汁，才能把唱词的韵味和节奏在西班牙语中体现出来。”雷林科的翻译作品远不止此。她曾说：“令人惊奇的是，简短的诗歌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如此生动的

画面。”这位西班牙汉学家在中国古诗，尤其是唐代李白、韩愈等名家诗作的译介方面也颇有建树，足见其语言、文学功底之深厚。

2021年，雷林科开辟“中译再西译”的先河，将林纾和陈家麟根据英文版《堂吉珂德》翻译而成的文言文版《魔侠传》回译成西班牙语。《魔侠传》的文言文语言简约且没有标点，翻译难度极大。雷林科基于多年翻译和研究积淀，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秉持兼顾创新与忠实原文的基本立场，研读对比几乎所有汉、英、西三语文本，译出500余页的西语版本，并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添加近700个中国历史文学知识的注释。雷林科的回译是颇有启发、卓有成效的实践，既为读者提供了多元视角，又为他者回译提供有益参考。

深耕汉学研究。雷林科通过撰写序跋、添加注释等丰富的副文本形式，将对作品深度研究后的理解和观点融入译作之中。在《牡丹亭》的前言中，雷林科首先介绍作者汤显祖的生平及著作，进而为读者解读其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此外她还概述《牡丹亭》故事情节点及作品的影响与意义，注重基于西班牙语读者阅读需求与特点展开比较研究。她认为：“汤显祖是同时期堪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文学大师，因为二者都创作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戏剧。尽管作为剧作家，汤显祖的作品并没有比莎士比亚多，生平总共五部戏剧作品，然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牡丹亭》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在翻译《文心雕龙》时，雷林科增补翔实的注释，解释人名、地名，阐释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如中医药词汇等，系统深入地向读者展示了原著的全貌。

秉持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雷林科对中国文字也颇有研究。在研读大量古籍基础上，以汉字“男”

群众满意引领方向，因时因地、靶向施策，让群众看到真变化、感到真成效、获得真实惠。

深化运用群众点题机制。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把准群众脉搏、精准服务群众。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群众点题机制，全面对接大信访、“12345”政务热线等民意渠道，分析研判最影响群众获得感的突出问题、具体事项，坚持哪里有问题就向哪里出击，在抓好中央纪委监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整治项目基础上，紧密结合实际每年滚动推进一批“自选项目”，加大下沉指导、明察暗访、公开接访、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推动将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清单及时转化为工作清单、成果清单，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直击民生领域顽瘴痼疾。越是涉及广、反映多、矛盾大的民生事项，越是群众最关心、整治最迫切的重要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持续深化整治与推动民生项目落地、精准补齐民生短板紧密结合，合力办成一批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实事，深化治理“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以及居民小区物业管理、民生服务事项外包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个性问题点对点解决，共性问题面上整改，多发性、同质性问题系统整治，让广大群众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不断增强获得感。

加强整治项目闭环管理。集中整治成效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工作成果有效的评判权交到群众手中，充分听取群众的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满意度低、化解周期长的问题，通过专题会议、调研谈话、发函督办等方式跟进监督，督促各地各部门用心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群众评议不满意、问题整改不销号”，坚决杜绝表面整改、敷衍整

“女”为抓手，雷林科曾发表学术文章《中国文字与女性：从世界的起源到从属》。文章首先向读者简述中国文字统一的历史进程，指出汉字与具有阴阳性之分的西班牙语的差异，再从“女”字的起源、字形演变、“女”字的构词角度阐述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汉字的象形意义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雷林科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选取了近30个以“女”字为偏旁部首或与之相关联的汉字进行解构，这一将中国文字解读与中国女性问题研究相结合的文章，生动形象地普及了中国文字、社会知识，进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随着对中国语言、文学认识的加深，雷林科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涉猎中国戏剧、电影，并擅于透过浅层次的梳理，深入解读中国社会与历史。其研究成果《从影戏到政治：中国电影的形成》，从旅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1908年在上海搭建的第一家电影放映室铺陈开来，讲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变革及代表性作品。雷林科的汉学研究成果还包括《中国叙事：小说和其他非文学形式》《中国文学》等百余篇学术文章及20余本专著。大量的译著与研究体现了雷林科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化、历史、哲学等多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系统把握。

传播中华文化。雷林科在学术组织、国际会议、课堂授课中通过译本、报告和课程，潜移默化地展开译本推介与文化传播。作为导师，她培养的大批青年人才与友华人士以其译著作为品评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学的蓝本。作为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她以翻译与研究为基础，侧重从译作所处的历史角度诠释现实，启发学生理解并热爱中国历史与文化。在课堂外，雷林科通过举行朗诵会等形式积极为作品“代言”，曾在马德里中

改、虚假整改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确保群众反映问题有回音、有措施、有结果，实现整治项目从“群众点题”到“群众评议”的闭环管理，以实实在在、有始有终的工作成效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守正创新健全抓根治本的长效机制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必须以体系思维、系统观念推动“治当下”与“管长远”相结合，由表及里查根查源、建章立制促改促治，不断铲除风腐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完善监督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监督体系是整合监督力量、汇聚监督资源、贯通监督主体，常态长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集中整治为实践载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以专责监督为主干、以基层监督为支撑、以贯通协同为保障，不断完善基层监督体系，形成党委主导、纪委主推、部门主办、市县主战的工作格局。深入开展对同级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一把手”的谈话监督，将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作为必谈内容，精准传达要求、传递责任、传导压力。构建省市县三级派驻机构上下联动、密切配合的对口监督机制，加强会商研判和协同监督，一体解决表现在基层、根子上面的问题，一体推动职能部门守土负责、为民尽责。分行业分系统分领域建立精准发现、及时纠正、系统整改、有效预防问题的工作机制，围绕国有资产清查利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疗检验检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形成多个应用场景，切实发挥实战效能，以密集的应用场景矩阵，逐步形成整个监督体系图谱，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基层善治、维护群众利益的实践成效。

国文化中心“悦读中国”读书俱乐部与读者畅谈《牡丹亭》。

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雷林科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雷林科曾翻译《赵氏孤儿》并推动其舞台剧上映，该剧将中国古典元素与地中海、加泰罗尼亚地区文化相结合，融入西班牙瓦伦西亚当代诗人的诗句，另由伦巴乐队的手风琴与西班牙吉他为其配乐，演出在当地引发强烈反响，西班牙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雷林科此举将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人士由学术领域拓宽至公众层面，为中国典籍推介与文化传播拓展出新路径，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开拓性尝试。

此外，雷林科还呼吁利用新技术、新媒介、新平台推动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多样化发展。雷林科在首届中国古代小说海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应当抓住当前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有利契机，将古典文学的传播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可通过舞台演出、影视作品、数字化出版物及游戏等多元载体，增强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兴趣，建设中外出版机构协作网络阅读平台，拓展典籍传播生存空间，促进传统文化海外传播。

时至今日，雷林科仍在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学中孜孜不倦地追求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雷林科的汉学研究，既是基于个人学养而进行的文学翻译、研究和阐释的职业行为，又折射着良性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互鉴，有力助推着中国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译介与传播。



做实以案促改，提升治理能力。铲除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尤为关键。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三不腐”一体推进综合效应，把正风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推动案件查办和以案促改促教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充分运用案件通报、案件反思等制度，深入查找权力越轨的根源和症结，横向向上督促发案单位对症下药、靶向整改，纵向上推动整个系统举一反三三、源头治理。注重交好高质量办案、以案促改、以案促教“三张答卷”，加强个案深度剖析和类案专题分析，深入查找群众身边风腐问题滋生的土壤“是什么”、条件“有哪些”、原因“在哪里”，查深查透查全、查根查源查责，更高质量构建办案、治理、监督、教育完整链条，实现从个案查处向系统整治提升转变，进一步压缩风腐问题生存空间，让清风正气在群众身边更充盈。

助力基层减负，激励担当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天敌，群众极度反感，干部深受其累。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把基层的“痛点”作为整治的“靶点”，严肃查处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政绩观错位、加重基层负担等问题，坚决纠正文山会海、过度留痕、层层加码等问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展。把从善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來，深化运用“四种形态”，讲政策分善恶，敢纠错真容错，严肃规范精准慎重问责，严厉打击诬告陷害，做实澄清正名工作，全方位营造支持干部敢为善为的制度环境，以更为显著的减负赋能之效，持续焕发基层的活力与生机。

（作者系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